

黑龍江文史資料

第三輯

0.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55.0107

K250.6

43

2:3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A 869615

责任编辑：刘文新

封面设计：蒋 明

封面题字：周慧珺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铅印室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 12/16 字数147,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93·06

定价：0.80元

目 录

回忆北方会议前后

.....李 实 (1)

奇取北兴镇

.....王明贵 (7)

前仆后继 英勇抗日

——回忆1937—1942年抗日活动片断

.....王 钧 (26)

珠河反日游击队片断

.....董长义 (85)

裴成春烈士及其一家

.....李在德 (107)

格金河的抗日风暴

.....张学礼 (112)

一九三二年海、满抗战始末

.....苏炳文 (120)

海、满抗战纪实

.....谢 柯 (143)

朴炳珊在拜泉抗战中

.....李铭新 (162)

回忆东北民众救国军抗敌后援会

.....高众青(170)

黑龙江省政纪要

(一九〇四——一九三一年)

.....**宋云同**、**刘乃康**(174)

华俄道胜银行在华活动的真面目

.....任浩然(188)

清末以来的双城府乞丐处

.....**张润清**(206)

墨尔根——嫩江镇

.....田丰(211)

回忆北方会议前后

李 实

我在北方会议前后这一段亲身经历，虽然时隔五十来年，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受中共中央组织局委派，以巡视员的身份，利用半个来月的时间，巡视了满洲。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检查纠正立三路线的转变情况，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红五月工作”决定。

我到沈阳以后，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给我介绍了省委工作情况。可是，由于张应龙到职不久，情况尚不熟悉，未能详细介绍纠正立三路线后的转变情况。另外，当时作为巡视员的我，本身也没划清正在推行的王明路线与立三路线的分界线，因而也就没有觉察到满洲省委纠正立三路线的明显转变。这时，中共中央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定已经下发到满洲省委，这样一来，我在省委会议上的传达就变成重复文件的要点了。至此，我的巡视任务算告完成。

我巡视满洲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在大连、沈阳等地到处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征兆：日本特务在大连十分嚣张，外来的客轮靠近大连港时，日军就用轮船送一批便衣特务上客轮，这些特务上船后便混在旅客中察颜观色，如发现“可疑分子”，就一直追到其住处逮捕。旅客下船后，得排成队走过大连码头再上天桥，以便日本特务能抓到

“可疑分子”。日军在大连街道、码头上设有军事据点，军警在据点里用电话互通情报。南满铁路沿线各站已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据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控制了这些地方的行政权、警察权（司法权）、文化教育权等。在沈阳市日本军警到处横行，随意到旅店查户口，对中国人民进行迫害……。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在加紧实现其“田中奏折”的吞并满、蒙的侵略计划。根据这些情况，我对满洲省委讲：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势必以武力侵占满洲，所以省委的工作中心应放在沈阳兵工厂和沈阳附近的驻军士兵的工作上（驻军系指张学良的东北军）。同时，我还向他们介绍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做士兵工作的一些经验。

返沪后，我向张闻天、李竹声详细汇报了这次巡视的情况，得到了他们的重视。他们认为，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要侵略满洲的动向有分析，有政治见解，并且还有组织措施，随即张闻天同志和李竹声责成我替中央起草一封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这以后，中央又派我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去巡视。一九三二年北方会议后，中央派我到满洲省委担任组织部长兼代理省委书记，直至一九三三年十月调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长之前，我一直在满洲省委。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团中央书记博古、组织局书记李竹声主持，我担任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当时，我是组织局的巡视员，因为我自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巡视了满洲、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多少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所以让我也参加了北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北、河南、陕西、

山东的省委书记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以及中央的张闻天、博古、李竹声、康生和我。会议共开了七天。开始由博古讲了这次会议的目的，然后由各省汇报本省的政治、组织情况以及肃清立三路线的转变情况，最后由博古作了会议的总结。

召开北方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流毒、反对右倾，以便进一步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当时，在白区由于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幌子，变本加厉地推行一条新的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群众都不接受，白区省委工作也深入不下去。对此王明认定是白区省委右倾，并想方设法要解决这个右倾。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召开了白区北方几省负责人会议。在会议上，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在汇报时谈到了满洲的特殊情况。据我记忆他主要谈了如下两点：其一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满洲，关内与关外被隔开，满洲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伪政权满洲国已成立，政治、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敌人手里，东北人民蒙受双重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尚未伸到关内，这点关内关外不一样。再则，满洲人民文化、政治水平较低，文盲多，学校教育很不发达，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影响较深，更没有经过象关内那样的大革命。针对满洲的这些特殊、落后情况，应采取特殊办法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何成湘没谈及特殊办法。这时，何成湘就被博古等人给扣上了“满洲特殊论”和“满洲落后论”的帽子，并遭到批判，他们把何成湘批得懵头转向。另外，陕西省委书记杜某也因为没有贯彻好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遭到严厉批判。

在北方会议上，博古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于不顾，硬

说什么中国革命处于空前高涨时期，革命危机普遍成熟，要求我们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死斗争”。不论哪一省、哪一地区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着，那就都应该向国民党进行暴动、进行武装斗争，当然满洲也不例外。博古的这些说法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是站不住脚的。当时，虽然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已经连续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正准备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但是全国的革命发展很不平衡，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满洲与关内的情况显然不同，对于这点，只要有点马列主义常识，尊重客观实际的人都会一目了然的。

根据博古在北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起草并通过了《北方会议决议》，随即发至各省。由于北方几个省委都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敌人的破坏，给革命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北方会议刚结束，我就被派到满洲省委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兼代理省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八月，为了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在哈尔滨市南岗，由我主持召开了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共开了三天。参加会议的有魏维凡、罗登贤、何成湘、詹大权、李泽民、杨靖宇、小金（白杨）、杨德如、徐宝铎、王亚堂、珠河中心县委书记老崔等。在会议上，我先传达了中央《北方会议决议》，然后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讨论中没有不同意见，都是一边倒。因为当时党内缺乏民主生活习惯，再加上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有限，目击中央不少同志遭到王明临时中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谁也不敢反对这个左到家的《北方会议决议》，更没人敢提及满洲情况特殊等问题。在会议上，由我起草并通过了满洲省委接受《北方会议决议》的决议，其内容也是大反特反

了“满洲特殊论”，左得很。

不论是在召开北方会议的时候，还是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北方会议决议》的时候，与会者都是那样的左，写的决议也是那样的响当当、硬梆梆。可是决议到下边就贯彻不下去了，遭到了基层支部和党员的抵制。这是因为基层同志们尝到了执行立三路线的苦头，明白这个《北方会议决议》和立三路线在实质上一样，无非是要罢工、罢课、示威游行等。我们省委的同志在哈尔滨协助市委书记杨靖宇同志和市委组织部长杨德如同志往下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的时候，一开始就碰鼻子了。支部的同志们都躲避我们，连支部会议都召集不起来了，甚至找个别同志谈话都是困难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先不急于跟支部同志们谈有关北方会议的问题，而是采用个别谈心的方法，谈一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以后的情况、群众的想法以及我们的出路何在等问题。这样逐步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为支部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才召开了支部会议，并传达、贯彻了《北方会议决议》的精神。

北方会议之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举行的哈尔滨电业局工人罢工斗争和呼海路铁路工人斗争，是我们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种表现。哈尔滨电业局工人罢工斗争，虽然增加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也打击了敌人，但是却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这就给革命力量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在呼海路铁路工人中已经有不少党、团员，同时也建立了工会组织。不仅在呼海路的各站、各岔道口都有我们的同志，而且在火车司机、乘务员中也有我们的同志。因而，党组织能够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经

常在呼海路的各站同时张贴传单、标语，造成红色恐怖的局面，使日本侵略者惊恐万状。对此，敌人加紧了对乘客行李的检查，加重了对群众的迫害，致使群众不敢乘坐这段火车。这就使得我们脱离了群众，暴露了自己的力量，遭到了一些损失。

总之，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九一八”以后给满洲省委的工作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而北方会议所带来的危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这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却是应该记取的。

（元仁山整理）

奇 取 北 兴 镇

王 明 贵

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小兴安岭西麓的南北河地区，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根据中共北满省委的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三、六、九、十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下属四个支队。任命我为三支队支队长，赵敬夫为政委，王钧为参谋长。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制定了第三路军各支队一九四〇年的活动方针和计划，决定我三支队以朝阳山、五大连池为后方依托，在嫩江、讷河、德都、克山、泰安地区，与龙北特委领导下的地方工作相配合，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密 林 定 计

巍巍的小兴安岭西麓，有一条三百多里长的河流，叫南北河，由南向北流去，一出小兴安岭就叫讷谟尔河了，它折转向西流入嫩江。南北河两岸山峦起伏，生长着高大的红松、落叶松和柞树、桦树，遍布稠密的幼林和荆棘丛。这里沟岔交错，渺无人迹，到了冬天，刺骨的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刚刚走过的脚印，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三支队，当时就出没在南北河上游的密林中。

那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初的一天，南北河还没有解冻，可是

向阳山坡上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已经开始融化。偶尔在山崖石旁露出一朵朵淡黄色的冰凌花。春天已经来到了小兴安岭。我和赵敬夫同志带着十几名战士，骑着马，离开了驻扎在南北河支流——土鲁木河边的三路军指挥部，回到了三支队的驻地。我们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抗联第三路军的决定，还把从总部带来的手榴弹发给战士们。那时，我们的部队第一次有了手榴弹，战士们非常高兴，士气更旺了。

太阳落山了，战士们围着一堆堆篝火，唱着抗日的战歌。在一堆篝火旁，我和赵敬夫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制定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

赵敬夫同志，当时二十多岁，原是抗联三军某团的政委，他曾在北安、克山、讷河一带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他说：“我们要在朝阳山地区站住脚，就必须把北安省组织的‘讨伐’队消灭掉！”

原来，一九三九年，抗日联军龙北指挥冯治纲，并王钧、耿殿君、姜福荣等同志，在地方干部方明玉、尹子魁、女陈的配合下，带领部队打开了讷河县城。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我们的部队，同时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也有很大发展。我们的游击区从小兴安岭边缘，扩大到北安附近十几个县的平原地区。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扑灭熊熊燃烧起来的抗日烈火，狡猾的日军想出了一条毒计，成立了一支二百多人的骑兵“讨伐”队。这支“讨伐”队的成员，全部经过日军苦心挑选：一是要对共产党和抗日联军有仇的；二是要枪法准、马术好的。只要够这两个条件，不管是瘸子、大烟鬼，还是罪犯、土匪，都一律收容厚待，配备有精良的武器，一色的捷克式和奉天兵工厂造的韩林春式步

枪。还从几个县里挑选出最好的快马给他们。于是，那些投降日伪的叛徒、土匪、地痞、流氓，就成了“讨伐”队的骨干。这支“讨伐”队驻扎在克山北、讷河与德都之间的北兴镇。他们凭借着地形熟、枪法准，了解我抗联部队的战术和习惯，又仗着有日军和伪军的配合，穷凶极恶，不可一世。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我抗联部队没少吃它的亏。英勇善战的耿殿君团长，就是被这支凶恶的“讨伐”队杀害的。所以，赵敬夫说：这支“讨伐”队，是我们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最大障碍，必须首先消灭它！

可是要打“讨伐”队并不容易。“讨伐”队驻扎在北兴镇，北兴镇北面的嫩江县，驻有日军一个师团，西边的讷河镇驻有伪军一个团，东南方向的北安镇，是当时伪北安省省会，驻有上万日军。北兴镇居嫩江、讷河、克山、德都中间要地，无论哪里发现了抗日联军，这支“讨伐”队都首先出马，其他敌人也及时配合围剿。敌人的兵力有上万之多，我们三支队当时只有二百来人，怎样才能消灭这支罪恶累累的“讨伐”队呢？

我们分析了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有利条件：北安地区有六支队活动，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五大连池及朝阳山的地形，有利于部队的迂回和伏击敌人；现在平原上的积雪已化尽，江河还未解冻，有利于我骑兵部队远距离奔袭和迂回行动。我和赵敬夫制定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想把“讨伐”队引诱到朝阳山，利用有利的地形伏击敌人，给“讨伐”队以重创之后，再杀它个回马枪，端掉它的老巢——北兴镇。

第二天，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同志带着指挥部的同志们路过我们的驻地，我立即把我们消灭“讨伐”队、攻打北兴镇的计划，详细地向李兆麟同志作了汇报。李兆麟同志十分称赞我

们的计划，当指挥部的同志们离开我们这里时，兆麟同志又亲切地对我们说：“祝你们胜利！”我们信心百倍地回答：“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庆祝第三路军的成立！”

调虎离山

四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支队一百五、六十人的骑兵队伍，从南北河上流东岸出发，向西北方向挺进。穿密林，翻山岭，马蹄踏着象棉絮一般的积雪，行军一百多里，天傍黑，我们走出山林，进了一个屯子，住了一宿。第二天，我们告诉老百姓向敌人报告，就说抗日队又回东山了。天黑后，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出村向东走了一段路，然后绕了一个圈子，转而向西奔去。后半夜，我们顺利通过了北黑铁路线。东方吐出鱼肚白时，部队悄悄进入了赵家店。这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屯子，我们一进屯，就在四周布置好警戒，不论大人小孩，只准进不准出；因为屯西五里地有一个王家油坊大地主是个汉奸，那里还设有伪警察署。同时，赵家店离伪北安省城只有三十多里地，驻有上万的敌人，万一走漏风声，敌人乘汽车半个小时就能赶到，我们的行动计划就会落空。

天亮了，人们忽然发现屯子里来了这许多穿日本军装的人，牵马挎枪，老百姓十分恐慌。我们向老百姓作了抗日救国的宣传，人们才放下心来。从远处看这个屯子，炊烟缕缕，象往日一样平静，谁能猜想到这里隐蔽着一支抗日联军的骑兵队伍呢。

天黑以后，我们悄悄离开了赵家店，踏上北安通向德都的公路，直奔德都。跑了四十多里路，接近德都时，我们离开了公路，进入一个叫“十三号”的屯子。这个屯子离德都只有十来里地，按计划我们要在这“大闹”一番，刺激刺激敌人。我们叫来电

长，给了他一些钱，买了两口大肥猪，让战士们饱餐了一顿。饭后，各大队分头召集群众大会，要求每户至少派一个人参加，大造声势，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书的精神。

我和赵敬夫找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召集了屯长和屯中有威望的老人开会。有几个小学教员也闻讯赶来，说是要听听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我向他们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人民的抗日武装。”接着，我和赵敬夫又宣传了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中的思想，我们说：看起来日军是强大的，有飞机大炮，可是日本是小国，缺乏资源，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乍一看，中国弱，但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上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不会亡国。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到底，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在日寇铁蹄下深受熬煎的民众，听到这有理有据的宣传，心中象点亮了一盏明灯，特别是那几个有文化的老人，更是心悦诚服，连连点头，称赞道：“共产党里有能人，讲得有道理，令人佩服！”“中国不会亡国，日寇侵华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一夜，抗日的怒火在屯中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心里燃烧着。

天快亮了，我嘱咐屯长：“我们走后，你去德都报告，就说有百八十人的抗日队，在屯里大吃大喝，住了一宿，天亮往五大连池方向走了。”屯长十分感激，因为日寇规定：每天上午八点钟，每个屯必须报告是否屯里住了抗日队，如不报告，就以反满抗日论罪，全屯抄斩。我的一番话，怎么能不使屯长感激呢！但他哪里知道，这正是我们的调虎离山之计！我再三嘱咐：“人数

只能少说，不准多报。”因为同情抗日的老百姓，总是把我们的人数扩大好几倍，以迷惑、吓唬敌人；而这一次，如果把我们的人数说多了，把北安的日伪军也吸引出来，我们的作战意图就会被打乱。屯长一口答应按我的嘱咐办。我们在屯里又撒了一些传单，然后才穿过蒙蒙的晨雾，离开了屯子。

天亮时，我们已跨过冻着的讷谟尔河。为了引诱敌人上钩，还要保持我们的人和马的体力不至于消耗过多，部队不紧不慢地走着。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五大连池东部的龙门山。在山里吃饭喂马，我带着几个干部去察看地形。我们爬上龙门山上的一座石崖，向四外眺望，十三架名山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突兀而起，五个相连的火山堰塞湖，象一串晶莹的珍珠被群山环抱，长长的白龙河象一条银色的带子穿过这串珍珠，弯弯曲曲地通向讷谟尔河。二十多里长的石龙逶迤蜿蜒在池边，阳光洒落在封冻的冰面上。在药泉山下，雾气腾腾，那里有许多火山温泉。湖的对岸，隐约可见卧虎山。脚下的龙门山和它北边的尾山连接在一起，犹如一条长长的玉龙，盘踞在五大连池的东岸。几年来，我们抗联部队利用这里的山地，曾多次与敌军周旋，打了不少漂亮仗。如今，我们要利用这居高临下的地形，阻击敌人，然后再把他们引向朝阳山。

龙门山上，住有两三户烧木炭的人家，他们把我们让进自己矮小的窝棚，端上一碗碗清亮亮的矿泉水，招待我们。在这里，我们足足等了半天，太阳都落到卧虎山后去了，可是德都方向，一点敌人的影子也没有。我和赵敬夫分析：那个屯长一定会去报告的，而敌人也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决定在龙门山上露营。